

转型国家私有化、企业治理与经济增长

杨 晓

内容提要:基于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发展银行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重点分析了政策、制度、初始条件在解释转型国家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而且对比了这些变量中期与长期的作用差异。研究表明,不论是长期还是中期,法制环境的作用效果均显著为正;国家能力的作用效果长期为负,中期为正,但均不显著;企业治理与重组、初始条件、私有化水平、私有化速度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效果在长期和中期均存在着方向上或者显著程度上的差异。

关键词:转型国家 私有化 国家能力 经济绩效 企业治理

中图分类号:F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7)10-0003-11

“转型”主要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近30年来整个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但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却充满了争议,其主要源于各学派对转型方法的争论。转型方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休克疗法,另一类是渐进式改革。休克疗法中最适宜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快地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此方法的倡导者不重视或者不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基础制度达成的最佳方式是快速私有化,私有化完成之后,基础制度就会自动生成。而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认为,制度效果的显现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私有化有可能会成为资产倒卖或者流失的手段而不是财富创造的工具。黑尔和特利(Hare & Turley, 2013)研究表明,执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可谓是喜忧参半,而执行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和越南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但是如何解释两类方法在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却存在着争论。

现有的研究仍未能清楚地解释转型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综合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有限的截面数据使转型国家各方面的初始条件不能被准确量化;第二,指标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且某一特定变量的作用效果存在多种解释;第三,回归分析中政策和制度变量可能存在着内生性问题;第四,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结论经常在不同的研究中存在着不一致性。

因此,本文将基于现有的短期与中期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尝试处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私有化政策、制度以及初始条件三方面来分析转型国家的绩效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区分私有化水平和速度,比较不同被解释变量情形下同一解释变量的作用,而且还将对影响因素作用的中、长期差异进行对比。

收稿日期:2017-01-19

作者简介:杨 晓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深圳市,518060。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一、转型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研究综述

在现有转型国家经济绩效差异解释的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因素分为:第一,研究政策对增长的作用,具体政策主要包括自由化,私有化水平、速度、方式(包括为了解决政策指标内生性问题所使用的工具变量);第二,关注初始条件的重要性,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负担”;第三,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法律制度。

(一) 政策的作用

德梅洛等(De Melo et al.,1996)对转型国家自由化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自由化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2]。斯洛斯基和马丁(Selowsky & Martin,1997)利用前者的指标构建了转型国家的面板数据,结论与其结果基本相似^[3]。因此,这些研究经常被认为是支持快速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然而,后续研究表明,这些结果并不稳健。奥斯伦德等(Åslund et al.,1996)采用累积自由化指数来解释转型国家的增长率,但把卢布区和遭受战争国家虚拟变量加入模型后,自由化指数的系数为零,且不显著^[4]。菲德尔穆茨(Fidrmuc,2003)指出,自由化应归功于初始条件^[5]。

除自由化政策之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私有化、稳定化以及管制与竞争政策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戈多伊和斯蒂格利茨(Godoy & Stiglitz,2006)认为,私有化速度与私有化水平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显著为正,后者则显著为负^[6]。哈姆等(Hamm et al.,2012)研究表明,大规模私有化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作用^[7]。维克斯和亚罗(Vickers & Yarrow,1989)认为管制和竞争政策可以通过私有化来最终影响经济绩效,同时执行私有化政策与建立管制框架的国家更能够促进竞争,进而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8]。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9)^[9]也持同样的观点。

(二) 初始条件的作用

德梅洛等(De Melo et al.,2001)首次研究了初始条件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初始条件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是很重要的,并且初始条件的影响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减弱^[10],这与戈多伊和斯蒂格利茨(Godoy & Stiglitz,2006)^[6]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加入初始条件的回归中,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影响却变为负向,但不显著。波波夫(Popov,2000)在控制了初始条件的基础上,研究表明累积的自由化指数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法治效果显著^[11]。伊贝伊和默雷尔(Heybey & Murrell,1999)研究表明,初始条件显著,自由化水平与自由化速度的效果不显著^[12]。

(三) 制度的作用

转型初期,制度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基本上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原因之一主要是缺乏合适的度量制度的数据,坎波斯(Campos,2000)^[13]在确定度量制度的数据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布鲁内特等(Brunetti et al.,1997)首次使用法律和政治制度来解释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正向影响^[14]。格罗根和莫尔斯(Grogan & Mores,2001)研究表明,在所有情况下,“好”制度与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化,但却不显著^[15]。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1)对私有化指数、企业治理制度以及二者的交叉变量的研究表明,私有化对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另外两个变量的影响却相当的显著^[16]。戈多伊和斯蒂格利茨(2006)^[6]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制度对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现有的成果大大丰富了转型的相关研究,但是在跨国家绩效差异的研究中,从不同阶段(短期、中期、长期)来比较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很少。因为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入,某些在短期和中期可能重要的因素,在

长期看来,至少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如戈多伊和斯蒂格利茨(2006)所认为的那样,此类关于转型国家的相关研究应该不断地反复,可能十年之后,所有的这些问题均已经迎刃而解^[6]。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鉴于本文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在长期与中期的差异性比较,因此,转型时间跨度的划分将是非常必要的。截至目前,转型已走过 20 多个年头,为了便于与先前的研究进行比较,本文大致把转型的第一个十年即 1990—2001 年作为中期来对待;另外由于数据的局限性,把 1990—2014 年的转型跨度看作长期。转型期的经济绩效,分别采用 23 个国家 GDP 总增长率($\ln(\text{GDP}_{2014}/\text{GDP}_{1990})$)和 GDP 平均增长率来衡量,为了加以区分,分别使用 growth14 和 gr9014 来表示,相应地,中期的经济绩效则可以表示为 growth01 和 gr9001^①。增长数据均可以通过《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WDI)简单计算获得。

对经济绩效差异的解释,本文分别从政策、制度以及初始条件三个方面来进行。政策包括私有化水平和私有化速度;制度主要涉及宏观层面的制度(法制环境、国家能力)和微观层面的制度(企业治理和重组);初始条件主要涉及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制度条件。

根据欧洲复兴发展银行(EBRD)对私有化的分类,私有化可分为大规模和小规模私有化两类。大规模私有化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方式使得企业财产私人占有比例达到或者高于 75%,并且企业的治理是有效的;而小规模私有化的目标是小规模企业不存在国有股份,并且企业所占土地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易。当达到上述目标时,意味着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水平已经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私有化水平相当。从转型过程来看,私有化过程的争议最大,尤其是私有化速度,在分析中分别使用私有化水平和私有化速度来进行,并且私有化水平又分为整体和大规模私有化水平两类,私有化速度也类似。大规模私有化水平的数据可以通过 EBRD 转型数据库直接获得,而整体私有化水平及速度的计算则参照戈多伊和斯蒂格利茨(2006)^[6]的方法来进行。长期和中期的私有化水平分别使用 2014 年和 2001 年的水平来表示。例如,2014 年整体私有化水平 = $1/2$ (2014 年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 2014 年小规模私有化水平)。私有化速度的计算则需要借助私有化水平来实现,例如,长期企业整体私有化速度 = $1/25$ (2014 年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 1990 年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 2014 年小规模私有化水平 - 1990 年小规模私有化水平);而长期大规模私有化速度则可表示为 = $1/25$ (2014 年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 1990 年大规模私有化水平);同样地,中期的计算方法与长期相似。

法制环境主要反映转型国家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重点涉及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政府对企业运行的干预程度。中期的法制环境数据来源于 1999—2000 年世界银行(WB)与 EBRD 对 25 个转型国家 4 104 个企业的调查问卷;而长期数据则来源于 2012—2014 年对 30 个国家 15 883 个企业的调查问卷。

亨德里克斯(Hendrix, 2010)对国家能力从理论及测度层面的研究表明,根据研究目标的差异,国家能力的研究可分别从国家军事能力、政府行政或管理能力、政治制度一致性及质量这三个方面出发来展开^[17]。本文侧重于前两个方面,即指政府从事公共事务的能力。公共事务一般包括建立国防与法律制度以保护个人及财产安全,实施宏观与规制政策以调节私人交易环境,提供公共基础设施等等^[18]。参照哈姆等

① 23 个转型国家分别为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摩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和越南在转型经济体中表现虽突出,但很少被纳入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为了与早期的研究进行比较,另外考虑到二者的加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

(2012)^[7]的研究,本文使用一般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的均值来表示国家能力,该指标数据源于WDI。

EBRD倡导的企业治理与重组要求企业治理要遵循市场与国内金融制度,重组则需要依据市场需求来实施。此数据可直接从转型数据库获得。

初始条件主要指转型国家转型起点时的制度状况,包括政策决定的透明度和执行的可信度、法律实施的质量和法制的本质、当地官僚或者行政质量、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这些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关性,因此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第一个主要成分来表示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该数据来源于坎波斯(Campos,2000)^[13]的相关研究,均采用的是正向指标,因此初始条件的预期作用方向为正。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 跨国家转型绩效差异的长期解释

长期来看,被解释变量为GDP平均增长率(gr9014)时,法制环境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管治与企业重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显著为正;初始制度条件的效果为正,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显著;私有化水平影响为负,均不显著,而私有化速度的影响均为正,但也均不显著,具体结果详见表1。相类似的是,被解释变量为GDP总增长率时(growth14),所有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均未发生变化(除私有化速度之外),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初始制度条件、治理与企业重组在不同回归方程中的显著性。从表2可知,法制环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仍然为正,并且显著;国家能力仍然为负,且不显著。制度初始条件对转型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但是当去除国家能力这一变量后,初始条件对经济增长均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初始制度条件对国家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影响,这一结果与表1相一致。用大规模私有化水平来表示私有化状态时,企业治理与重组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企业的治理与重组对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企业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不论是以私有化还是以国有方式存在,其企业绩效均会大打折扣。

表1 转型国家经济绩效(gr9014)差异的长期解释

法治	国家能力	初始条件	管治与企业重组	整体私有化水平	整体私有化速度	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大规模私有化速度	R ²	$\overline{R^2}$	Prob > F
1.40 (1.82)	-0.15 (-1.03)	0.26 (1.77)	2.52 (2.6)	-2.45 (-1.7)	13.90 (0.74)			0.55	0.38	0.03
1.47 (1.91)	-0.15 (-0.99)	0.28 (1.8)	2.38 (2.49)	-2.31 (-1.36)			10.50 (0.46)	0.54	0.37	0.03
1.71 (2.36)	-0.13 (-0.93)	0.26 (1.7)	2.22 (2.57)		14.45 (0.73)	-6.65 (-1.6)		0.55	0.38	0.03
1.80 (2.44)	-0.14 (-0.96)	0.25 (1.63)	2.24 (2.54)			-8.13 (-1.37)	20.80 (0.71)	0.55	0.37	0.03
1.53 (2.01)		0.35 (2.74)	1.85 (2.56)	-1.86 (-1.4)	11.62 (0.62)			0.52	0.38	0.02
1.58 (2.08)		0.35 (2.75)	1.75 (2.47)	-1.72 (-1.09)			8.20 (0.36)	0.52	0.38	0.02

表 1(续)

法治	国家能力	初始条件	管治与企业重组	整体私有化水平	整体私有化速度	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大规模私有化速度	R ²	$\overline{R^2}$	Prob > F
1.76 (2.43)		0.34 (2.64)	1.69 (2.61)		12.55 (0.64)	-5.28 (-1.36)		0.52	0.38	0.02
1.83 (2.48)		0.33 (2.59)	1.268 (2.57)			-6.32 (-1.12)	16.84 (0.58)	0.52	0.38	0.02

注:括号上方数值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括号中的值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值,以下各表均相同。

私有化水平与私有化速度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在未包括国家能力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大规模私有化水平使得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均变为了负向,但不显著。其余情形下的私有化速度与水平在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方面均未发生变化。总体而言,长期来看,即使在回归方程中使用了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与显著程度也基本一致。法制环境、初始制度条件、企业治理与重组是解释转型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国家能力、私有化水平、私有化速度对经济绩效的解释均不显著。

表 2 转型国家经济绩效(growth14)差异的长期解释

法治	国家能力	初始条件	企业治理与重组	整体私有化水平	整体私有化速度	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大规模私有化速度	R ²	$\overline{R^2}$	Prob > F
0.29 (1.71)	-0.05 (-1.48)	0.05 (1.46)	0.51 (2.4)	-0.45 (-1.39)	1.56 (0.37)			0.52	0.34	0.04
0.30 (1.77)	-0.05 (-1.47)	0.05 (1.46)	0.51 (2.42)	-0.46 (-1.24)			1.73 (0.34)	0.52	0.34	0.04
0.36 (2.18)	-0.04 (-1.23)	0.05 (1.45)	0.41 (2.06)		0.36 (0.08)	-0.85 (-0.89)		0.49	0.29	0.06
0.36 (2.16)	-0.04 (-1.23)	0.05 (1.42)	0.41 (2.03)			-0.90 (-0.66)	0.61 (0.09)	0.49	0.29	0.06
0.33 (1.91)		0.08 (2.57)	0.31 (1.84)	-0.26 (-0.85)	0.84 (0.19)			0.45	0.29	0.05
0.33 (1.94)		0.07 (2.57)	0.30 (1.87)	-0.27 (-0.75)			0.97 (0.19)	0.45	0.29	0.05
0.38 (2.23)		0.07 (2.49)	0.25 (1.64)		-0.21 (-0.05)	-0.43 (-0.48)		0.44	0.27	0.06
0.37 (2.18)		0.08 (2.48)	0.24 (1.61)			-0.37 (-0.28)	-0.55 (-0.08)	0.44	0.27	0.06

(二) 跨国家转型绩效差异的中期解释

根据表 3 和表 4 可知,中期来看,表现最为稳定的是法制环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不论是作用方向还是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同样国家能力也未发生变化,只是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而其余指标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变化,差异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被解释变量下,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差异。例如,被解释变量为总

增长率时(growth01),制度初始条件的作用均为正,但均不显著;而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时(gr9001),制度初始条件的系数为正,但是在不同私有化水平变量的影响下,其显著性明显不同,即在企业整体私有化水平的回归方程中,初始制度条件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在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水平的回归方程中,初始制度条件的作用则变得不显著。企业治理与重组和初始制度条件相类似,被解释变量为 growth01 时,企业治理与重组的系数均为正,但是均不显著;而被解释变量为 gr9001 时,企业治理与重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与制度初始条件系数的显著性正好相反,即在大规模私有化水平的影响下,企业治理与重组的作用显著为正,而在整体私有化水平和国家能力的影响下,其效果则不显著。第二,不同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有所变化。例如,私有化水平的作用方向不一致。被解释变量为 growth01 时,私有化水平(企业整体的私有化水平和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水平)的作用方向不一致;而被解释变量为 gr9001 时,私有化水平的作用方向均为负。第三,不同被解释变量情形下,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作用方向与显著性均发生变化。例如,被解释变量为 growth01 时,企业整体私有化速度的作用显著为负,而企业大规模私有化速度的作用方向为负,但均不显著;被解释变量为 gr9001 时,私有化速度的作用系数均不显著,且基本为正。

表 3 转型国家经济绩效 (gr9001) 差异的中期解释

法治	国家能力	初始条件	企业治理与重组	整体私有化水平	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整体私有化速度	大规模私有化速度	R ²	$\overline{R^2}$	Prob > F
8.37 (2.00)	0.17 (0.79)	0.49 (1.87)	4.27 (1.41)	-1.65 (-0.49)		-1.97 (-0.12)		0.64	0.51	0.00
8.72 (2.08)	0.16 (0.76)	0.48 (1.87)	4.61 (1.63)	-2.43 (-0.71)			3.75 (0.21)	0.64	0.51	0.00
10.34 (2.57)	0.08 (0.43)	0.33 (1.28)	5.41 (2.65)		-18.68 (-1.76)		23.95 (1.17)	0.69	0.57	0.00
9.06 (2.23)	0.11 (0.54)	0.38 (1.41)	5.10 (2.34)		-11.11 (-1.23)	6.34 (0.4)		0.67	0.54	0.00
8.85 (2.16)		0.46 (1.79)	5.71 (2.38)	-2.97 (-1.04)		1.05 (0.07)		0.62	0.51	0.00
9.1 (2.21)		0.46 (1.82)	5.84 (2.56)	-3.53 (-1.16)			5.52 (0.31)	0.63	0.52	0.00
9.5 (2.43)		0.35 (1.35)	5.78 (3.32)		-13.34 (-1.7)	8.16 (0.54)		0.66	0.56	0.00
10.69 (2.78)		0.31 (1.25)	5.92 (3.62)		-20.55 (-2.18)		25.61 (1.31)	0.69	0.59	0.00

表 4 转型国家经济绩效 (growth01) 差异的中期解释

法治	国家能力	初始条件	企业治理与重组	整体私有化水平	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整体私有化速度	大规模私有化速度	R ²	$\overline{R^2}$	Prob > F
1.03 (2.67)	0.01 (0.58)	0.03 (1.34)	0.05 (0.17)	0.21 (0.63)		-2.83 (-1.88)		0.62	0.48	0.00

表 4(续)

法治	国家能力	初始条件	企业治理与重组	整体私有化水平	大规模私有化水平	整体私有化速度	大规模私有化速度	R ²	$\overline{R^2}$	Prob > F
0.98 (2.55)	0.01 (0.72)	0.04 (1.55)	0.05 (0.24)		0.87 (1.02)	-3.21 (-2.13)		0.64	0.50	0.00
1.18 (2.74)	0.004 (0.17)	0.02 (0.90)	0.26 (0.89)	-0.11 (-0.32)			-0.62 (-0.34)	0.54	0.37	0.03
1.16 (2.62)	0.007 (0.33)	0.03 (0.90)	0.17 (0.76)		0.07 (0.06)		-1.15 (-0.51)	0.54	0.36	0.03
1.06 (2.83)		0.03 (1.29)	0.15 (0.66)	0.12 (0.47)		-2.62 (-1.83)		0.61	0.50	0.00
1.03 (2.79)		0.04 (1.45)	0.14 (0.81)		0.59 (0.79)	-2.97 (-2.06)		0.62	0.51	0.00
1.18 (2.87)		0.02 (0.91)	0.28 (1.24)	-0.14 (-0.45)			-0.58 (-0.32)	0.54	0.41	0.01
1.19 (2.82)		0.02 (0.87)	0.21 (1.19)		-0.087 (-0.08)		-1.22 (-0.47)	0.53	0.40	0.01

(三) 跨国家转型绩效差异的中长期比较

总体而言,与转型国家经济绩效增长的长期解释相比,中期的解释似乎更为复杂,长期和中期之间的差异详见表 5。

表 5 转型国家绩效影响因素的中长期比较

解释变量	长期 Growth14		中期 Growth01		长期 gr9014		中期 gr9001	
	符号	显著性	符号	显著性	符号	显著性	符号	显著性
法治制度	正	显著	正	显著	正	显著	正	显著
国家能力	负	不显著	正	不显著	负	不显著	正	不显著
制度初始条件	正	显著	正	不显著	正	显著	正	部分显著
企业治理与重组	正	部分显著	正	不显著	正	显著	正	显著
私有化水平(整体)	负	不显著	正、负	不显著	负	不显著	负	不显著
私有化水平(大规模)	负	不显著	正、负	不显著	负	不显著	负	部分显著
私有化速度(整体)	正、负	不显著	负	显著	正	不显著	正	不显著
私有化速度(大规模)	正、负	不显著	负	不显著	正	不显著	正	不显著

注:显著性指的是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为了便于分析,在进行中长期差异化分析过程中,其余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是在没有国家能力这一控制变量情形下的结果,数据均来源于表 1—表 4。

由表 5 可知,在所有解释变量中,不论长期还是中期,法制环境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其他变量的作用则在长期和中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1) 国家能力不论在长期和中期均不显著,作用方向也截然相反,中期为正,长期为负。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中期转型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经常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各方面均充满着不稳定,因此强的国家能力

可以保证政策、制度得以贯彻或者实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国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税收相关,经济衰退时,为了保障政策的稳定性及连续性,税收负担相对加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或者是国家能力(政府平均消费/GDP)很强,但是政府的消费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或者扭曲,也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

(2)初始制度条件中长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方面。初始制度条件在长期要更加显著,中期则部分显著。这一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制度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对后续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反地,如果初始条件属于“坏”制度范畴(不利于经济增长),那么要摆脱这一影响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一旦与之相对的“好”制度的作用减弱或者收益降低,这种“坏”的、“旧”的制度就仍然会起作用。中期部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转型过程初期所实施的某些政策或者制度有可能会破坏、抑制从而减弱了初始条件的影响,而随着转型的深入,当人们意识到这些“遗产”的重要性时,就会对此加以保护或者重视,从而逐渐获得收益。除显著性外,作用幅度也有所差异,但是本文的结论却不完全支持德梅洛等(2001)^[10]、戈多伊和斯蒂格利茨(2006)^[6]的初始条件的作用在长期会逐渐减弱的结论。本文研究表明,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时,初始条件的作用在长期看来确实在减弱,而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时,此种减弱则不存在,反而中期作用(不显著)完全要小于长期作用(部分显著)。

(3)与初始制度条件相比,中长期来看,企业治理与重组影响的差异性不大,主要表现在不同被解释变量情形下的显著性问题。不论中期还是长期,企业治理与重组均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企业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在市场化过程中,企业的内部治理要比企业私有化的方式、速度更为重要。

(4)企业整体私有化水平和大规模私有化水平在中长期也存在着差异。企业整体私有化水平,不论是长期还是中期,其作用方向基本上为负向,均不显著;而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水平在长期来看影响均为负且不显著,但在中期,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时,大规模私有化水平对转型绩效存在着显著负作用,而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时,大规模私有化水平的作用方向则不一致,均不显著。这说明,私有化水平并不是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而且在中期还存在着显著的负作用。这也说明,针对转型国家的绩效差异应该重点考察影响企业效率或者生产力方面更为深层次的决定因素,而不是仅仅关注企业的私有化水平。

(5)与其他解释变量相比,私有化速度这一变量在中期和长期的作用比较复杂。长期,企业整体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不显著,作用方向也不一致;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gr9014),作用方向为正;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growth14),作用方向不一致。中期,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gr9001),整体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则为正,但均不显著;而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growth01),企业整体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企业大规模私有化速度不论在长期还是中期,其效果均不显著。被解释变量不同时,中长期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作用方向的不一致。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大规模私有化速度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向;而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大规模私有化速度的作用方向却基本为负向。这一结果也说明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转型初期部分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重要。

为了进一步比较中长期的政策、制度及初始条件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仅对法治制度、初始制度条件、私有化水平、私有化速度的作用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6。剔除其他变量主要是因为:第一,剔除掉的变量本身可能与其他解释变量作用于被解释变量过程中起着中介或者调节作用,因此会影响其他变量的作用效果;第二,为了与戈多伊和斯蒂格利茨(Godoy & Stiglitz, 2006)^[6]的研究进行对比。根据表6,不同被解释变量情形下,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解释在中长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方面。首先,与上述的研究结果相似,不论是长期还是中期,法制环境对经济增长都存在着

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制度初始条件在绝大多数分析中也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整体私有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为促进作用,差异表现为中长期的显著性程度。中期来看,企业整体的私有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长期促进作用则不显著。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短期或是转型初期,转型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所释放的活力(大量闲置的人力资本及资金)确实对企业绩效的改善产生了促进作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但随着转型改革的不断深入,私有化水平的此类作用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其负面效应也逐渐开始显现;或者在其他变量的作用或者影响下,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私有化水平的促进作用都有可能变成阻碍作用,例如企业的治理水平(详见表5中的私有化水平的作用方向)。第四,与私有化水平相类似,企业整体私有化速度的作用均为负向,存在的差异也表现显著性上。企业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在以中期总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才显著,在其余的回归模型中均不显著。

表6 转型国家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比较

解释变量	长期 Growth14		中期 Growth01 ⁽⁶⁾		长期 gr9014		中期 gr9001	
	符号	显著性	符号	显著性	符号	显著性	符号	显著性
法治制度	正	显著	正	显著	正	显著	正	显著
制度初始条件	正	显著	正	不显著	正	显著	正	显著
私有化水平(整体)	正	不显著	正	显著	正	不显著	正	显著
私有化速度(整体)	负	不显著	负	显著	负	不显著	负	不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从20多年的转型实践来看,采用不同转型策略的国家的经济绩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为了验证两种策略的优劣,以及对转型国家经济绩效差异进行解释,本文从中长期政策、制度、初始条件的作用出发开展了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回归模型中包括国家能力这一解释变量时,不论是长期还是中期,法制环境对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能力的作用在长期为负,中期为正,但均不显著。初始制度条件对转型国家绩效差异的解释在长期似乎要更加显著,在中期则是部分显著。企业治理与重组不论在长期还是中期对转型国家绩效均存在着促进作用,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不同被解释变量情形下的显著性问题。企业整体的私有化水平不论是长期还是中期,其作用方向基本上为负向,并且均不显著;而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水平在长期来看影响均为负向且不显著,但是在中期,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大规模私有化水平的影响部分显著为负,而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大规模私有化水平的作用方向为正,但均不显著。企业整体私有化速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不显著,方向均为正;中期,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企业整体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整体私有化速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部分为正,但不显著。企业大规模私有化速度不论在长期还是中期,其效果均不显著,长期均为正,中期在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增长率时,作用方向为正,而在总增长率情形下作用方向则为负。

第二,回归模型中不包括国家能力时,法制环境对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初始条件长期显著为正,中期也为正,但绝大部分不显著;企业治理和重组的作用方向均为正,在总增长率情形下部分显著,而在平均增长率情形下均显著;整体私有化水平作用均不显著,长期均为负,中期绝大多数情形下也为负;大规模私有化水平作用方向基本为负,只是在长期不显著,中期则部分显著;整体私有化速度长期基本为

正,但均不显著,中期被解释变量为总增长率时,作用方向显著为负,而在平均增长率情形下时,则完全相反;大规模私有化速度长期基本为正,但均不显著,中期也不显著,但在总增长率情形下作用方向为负,在平均增长率情形下则为正。

第三,私有化政策对转型国家的经济解释并不稳定,不仅显著性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作用方向也有所变化,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治理和重组在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中存在着调节或者中介作用,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了治理或者制度在转型企业中的重要性。

第四,尽管本文的研究表明国家能力在长期与中期存在着作用方向的差异,并且均不显著,但这并不代表着国家能力在转型过程中不重要。波波夫(Popov,2012)、张凤林(2016)研究表明,国家能力对转型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19-20]。前者认为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衰退,部分是转型前的客观条件(工业结构和贸易模式的扭曲)所造成的,但多数还是转型期间逐渐衰弱的国家能力所致。本文的结果一方面可能是指标选取所致,由于涉及多个国家的数据,指标数据获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另外,文中采用的指标只能表现国家能力的概貌,未能刻画出国家能力包括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国家能力在长期的作用方向为负可能是由于转型国家在政府消费方面存在着扭曲或者效率低下,未能有效地发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或者是转型国家一味地以“小政府”甚至“无政府”为目标来对政府进行限制和改革,最终使得政府执行能力下降,腐败蔓延。

综上所述,转型是一个长期、复杂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过程,转型影响因素在长期和中期的作用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明简单的政策并不能促使转型国家顺利地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还需要支持转型发展的各个层面的制度基础。这意味着转型并不单单是政策制定与实施,更为重要的是政策体系背后的法律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资本以及习俗、规范等多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建设的支撑与相互适应、融合,只有在“搞对制度”的基础上,转型政策才能顺利实施。另一方面表明转型过程中各个转型国家需要根据国家的初始条件以及各自的发展阶段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才能使得转型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 [1] HARE P G, TURLEY G.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2] DE MELO M, DENIZER C, GELB A. Patterns of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6, 10(3): 397-424.
- [3] SELOWSKY M, MARTIN R. Policy performance and output growth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2): 349-353.
- [4] ÅSLUND A, BOONE P, JOHNSON S, et al. How to stabilize; lessons from post-communist countrie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6, 27(1): 217-313.
- [5] FIDRMUC J. 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9(3): 583-604.
- [6] GODOY S, STIGLITZ J E. Growth, initial conditions, law and speed of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11 years later[Z].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1992, 2006.
- [7] HAMM P, KING L, STUCKLER D. Mass privatization,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77(2): 295-324.
- [8] VICKERS J, YARROW G. Privatization: an economic analysis[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
- [9] STIGLITZ J E.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ransition[C].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9.

- [10] DE MELO M, DENIZER C, GELB A, et al.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the role of initial 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1, 15(1): 1 – 31.
- [11] POPOV V. 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the end of the debate (explaining the magnitude of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J].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0, 42(1): 1 – 57.
- [12] HEYBEY B, MURRELL 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peed of liberalization during transition[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1999, 3(2): 121 – 137.
- [13] CAMPOS N F. Context is everything; measur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Z].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269, 2000.
- [14] BRUNETTI A, KISUNKO G, WEDER B.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reliability of rul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former socialist countries[Z].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809, 1997.
- [15] GROGAN L, MOERS L. Growth empirics with institutional measures for transition countries[J]. Economic Systems, 2001, 25(4): 323 – 344.
- [16] STIGLITZ J E.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Corporate governance failures in the transition [C].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7] HENDRIX C S. Measuring state capacity;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ivil conflict[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0, 47(3): 273 – 285.
- [18] 张凤林. 国家能力与体制转轨——兼论新古典主义理论缺陷与中国改革的若干经验[J]. 学术月刊, 2016(4): 40 – 53.
- [19] POPOV V. The long road to normality; where Russia now stands[M] // Roland G.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he long run view.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317 – 343.
- [20] 张凤林. 新古典主义转轨理论错在哪里[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3): 60 – 72.

Privatiz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YANG Xiao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of countries growth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mainly analyses the roles of policies, institutions and initial condition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s the variables different in the medium and long run based on the survey on 23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emented by the World Bank an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le of law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oth in the medium and long run; and the state capacity has an in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in the long run and in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 the medium term; however, the effects (including sign and significa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structuring, initial conditions, privatization level and privatization speed on economic growth are mixed in the medium and long run.

Keywords: transition country; privatization; state capacity; economic performa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姚望春